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丛书

曹桂岑 考古文集

曹桂岑 著



科学出版社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丛书

曹桂岑考古文集

曹桂岑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目 录

自序	(i)
中原聚落概述	(1)
裴李岗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12)
裴李岗文化是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纪念裴李岗文化发现 30 周年	(18)
论仰韶文化的“二次葬”	(30)
濮阳西水坡遗址蚌图试析	(36)
濮阳西水坡蚌塑图释义	(40)
论龙山文化古城的社会性质	(45)
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文明的进程看中国文明的形成	(52)
我国的五帝时代与龙山文化	(59)
我国古代早期城址初探	(67)
河南早期古城建筑考古	(80)
探寻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106)
论中国古代的“五帝时代”	(110)
炎黄文化是中原文明的第一章	(121)
五帝时代都城考	(129)
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随想	(137)
黄帝时代是中华古代文明的开始	(147)
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古城考	(155)
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古城城名考	(162)
黄帝轩辕丘考	(165)
论我国古代的鼎文化与黄帝铸鼎	(171)
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的始建年代	(177)
虞舜都邑考	(188)
嫫祖考	(194)
郑州商城始建年代考	(199)
河南史前玉器	(208)

河南出土楚国玉器的研究	(222)
丹江口水库楚国贵族墓	(230)
淅川和尚岭春秋楚墓考	(232)
楚都陈城考	(237)
河南楚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242)
带纪年的楚系青铜器铭文之管见	(250)
楚国在春秋时期最早设县的探讨	(256)
试谈楚国货币	(264)
战国晚期楚国的埋葬习俗	(274)
淮阳楚墓论述	(280)
祐国寺塔（“铁塔”）	(286)
郾城县彼岸寺石幢	(288)
河南淅川和尚岭徐家岭楚墓发掘记	(292)
淮阳平粮台古城发掘亲历记	(295)
 附录	
曹桂岑先生著作存目	(303)
 编后记	 (306)

中原聚落概述

河南又称“中原”、“中州”、“豫州”，本文的“中原”，是指现今河南省行政区划。“中原”，地处黄河的中下游，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古文化的摇篮，中原是摇篮里的一颗明珠。“中原聚落”，主要指“史前”的新石器时代的村落。“聚落”是人类最早兴建的聚居场所，聚落是伴随着原始农业的产生而出现的，村落是聚落的一种基本类型，在聚落形成之初，村落和聚落的含义是相通的。《史记·五帝本纪》云：“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汉书·沟洫志》也说：“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村落（或称乡村、农村、村庄）与城邑（或曰城镇、城市、都市）都是聚落的一种基本类型，二者关系异常密切，城邑这种新的聚落形态，是从村落逐渐演进而来的。“史前”是指文字产生和实际利用文献记载以前的历史阶段，“史前”时代的时间范围下限限定在夏代以前，即公元前 2070 年以前，上限为距今 9000 年左右。

一、中国的地理环境孕育了由狩猎向农耕的过渡

中原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聚落，我们还要从中原原始农业何时开始出现进行探讨，首先需要对中国的地理环境予以介绍：从地理环境来看，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南部，地势西高东低，好像三级的阶梯：最高阶梯是青藏高原，平均海拔 4500 米，这里是世界的屋脊，上面横亘着一系列巨大的山脉，山岭间镶嵌着辽阔的高原和盆地；中级阶梯有蒙新高原、黄土高原和云贵高原等，海拔大都在 1000 ~ 2000 米；第三级阶梯是广大的东部平原和丘陵地带，除少数山脉外，大部分地区处在海拔 500 米以下。阶梯状分布的地势，加强了东部地区季风的强度，抑制了西部地区南北暖气流交换，从而加剧了我国气候的地域差异。在漫长的地质演化过程中，内外应力相互作用下塑造的地貌类型多种多样。不仅有纵横交错千姿百态的山脉，面积辽阔、形态各异的高原，也有广袤坦荡的平原，高度不一的盆地，层峦起伏、坡度和缓的丘陵，从而造就了异彩纷呈的自然景观。

中国气候的基本特征为大陆性季风气候，气候的大陆性程度，自东南向西北递增。在季风区中，冬季近地面层受高压系统控制，盛行偏北风，气候干冷；夏季受低压系统控制，盛行偏南风，气候温湿。气候类型复杂多样，以亚热带、温带气候为主。我国处于北纬 53°31' 至 3°52' 的中低纬度位置。北回归线穿过华南地区。从华南到纬度较高的北方各省区，由于太阳高度角的变化而使气温分布不同，形成自热带、亚热带到温带的温度带分布序列。我国大部分地区受季风环流影响，降水比较丰富，而且雨、热同期。但因降水主要来自夏季风，所以在降水分配上，存在着地区间的不均匀性、时间上的不

平衡性和年际间的不稳定性^[1]。

根据考古资料,我国的环境在最后冰期寒冷气候影响下,有一个明显的发展变化过程。最后冰期在欧洲称玉木冰期,我国一般称为大理冰期,其最盛期约在距今18000年前,是晚更新世以来全球性气候变冷的顶点,也是我国更新世后期气候变化的分界线。约在距今10300年时,冰期结束。旧大陆由狩猎向农耕过渡。其气候变化总体是由初期的转暖,中期达到最暖,后期又转凉的过程。而在全新世中期出现的最为温暖湿润的时期出现在距今8000~3000年,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到距今8000年时,气温急剧上升达到最高温度,一直延续到距今3000年左右开始缓慢下降。经对辽宁南部地区从更新世结束算起的全新世的沉积物(特别是对泥炭沉积物)进行孢粉学研究,发现一个切实可靠的气候变迁序列:普兰店期,距今10300~8000年;大孤山早期,距今8000~5000年;大孤山晚期,距今5000~2500年;庄河期,距今2500年。更新世结束之后,气候有了明显好转,生长繁殖的最佳时期在大孤山期达到顶峰,“大孤山早期是气候最温暖最湿润的时期,年平均气温13℃,较现在高出3℃~5℃……大孤山晚期……较早期干燥,但较现在高出2℃~4℃,年均气温为12℃^[2]。这个最新成果和在中国其他地方所做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根据西安、安阳考古发现的动植物种类,可知“自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以来,竹类分布的北限向南后退大约从纬度10°~3°。如果检查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各地的月平均温度及年平均温度,可以看出正月的平均温度减低3℃~5℃,年平均温度大约减低1℃……在近5000年中的最初2000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3]。也有人认为距今8000~3000年为仰韶温暖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出2℃~3℃^[4]。当时亚热带的北界比其现代位置(秦岭—淮河一线)大大向北推进,大约西起陕西关中平原北缘,东渡黄河之后,顺沿汾河谷地逶迤东北而去,斜贯山西高原,继而循永定河谷地,走燕山南麓而直趋渤海湾西岸。北京和天津处于亚热带北部边缘,气候状况与现在的河南信阳、安徽合肥及陕西汉中相类似。温暖湿润的气候,适宜于史前人类进行生产活动。

中国古代地理与气候情况,对于史前人们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经济活动方向和文化特征的形成,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严文明根据中国地貌与气候特征,认为中纬度地区是农耕文化的发祥地。他说:“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好像三级巨大的阶梯……这三级阶梯好像一把巨大的躺椅,背对欧亚大陆腹地,面朝辽阔的太平洋。由于地形和季风影响,低级阶梯湿润多雨,中级阶梯多属于干旱或半干旱气候,高级阶梯则严寒而干燥。因此,在整个史前时代,人类的活动地区主要在低级阶梯和低级与中级阶梯相交接的地区。这个地区跨越的纬度极大,自然地理条件也不一致。北部寒冷,南部炎热而多瘴病,人类的活动受到一定限制。只有四季分明的中纬度地区,即大致包括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及附近地区,才是最适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后来更成为农业起源的温床。”^[5]

二、中原地区铸造了华夏文明

石兴邦先生通过史前考古研究,把全新世中国生态环境分为三个生态带和若干小的亚生态带。它们是:(1)寒原带:东北、内蒙古、新疆和青藏高原的曲尺状的沿边地带,遍布高山大漠和草原,属于凉或寒冷的森林草原带,这里只适于低文化的生产活动,不宜于人类文化的发展。(2)温热带:长江以南地区,是温热的常绿阔叶林带,气候炎热,森林茂密,利于人类生存而缺乏交流与扩展。(3)温暖带: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北侧地区,气候温暖,四季分明,寒温适中,属草原阔叶林生长地带,有利于人类文化发展,世界主要文明多发生于这一纬度范围内。在这三个生态环境带之间,还夹杂着三个小的亚生态带:即草原与农业文化区之间的辽河流域地区;稻作与粟农作业之间的淮河流域过渡生态带;畜牧与农业地区之间狭长的横断河谷地带。这三个亚生态带是各不同地区与不同文化集团之间的融合纽带。此外,在沿海的岩岸和贝丘形成一个特殊的渔捞文化生态带。在上述诸生态带中,温暖带有利于人类文化的生存发展,特别是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最早铸造了华夏文明,并产生了国家组织:“就自然背景而言,华夏文明处于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东部与次生黄土接壤的中原地区……黄土地带的景观特点之一是茅草丛生,容易开垦,特别适于原始工具和耕作技术,广袤的原野和平坦的河谷阶地,是人类生存繁衍的最佳场所。居住在黄河及其支流的各部落之间,没有大的天然屏障隔绝,在同一地域,容易形成大的文化共同体。在频繁的接触和交往中,为协调和解决部落间的关系和问题,便逐渐形成了强有力的权力机构——部落联盟和联盟首领。她的发展,便产生了文明国家……但在长江流域则不然,文化发展水平虽不晚于也不低于黄河流域,但地处红壤区,气候炎热,森林茂密,湖泊纵横,河流交错,各氏族部落的活动,限于小的范围,仅长江中下游就有相互平行发展的不同文化共同体,像大溪文化、山背文化、薛家岗文化、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等。虽有同一性,但各有特异性……它们之间的地理分布是割裂的,小的范围活动,形不成像黄河流域那样大的文化共同体,不可能形成强有力的统领各部落的盟主,也就不能成为东方大地的主宰的中心帝国形态。”^[6]由于史前人类主要活动在中国地貌三级阶梯中的低级阶梯和低级与中级阶梯相交接的地区,亦即温暖生态带,故而史前聚落最早也应出现在这一地带及其附近地区。

中原及周边地区的总体地貌,形成于燕山运动早期,现代地貌格局形成于喜马拉雅运动晚期。远古时代,太行山以东是一片汪洋大海,泰山和一些山岳丘陵是海中的岛屿,今天的黄淮海大平原是由黄河冲积而成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在低地之中形成了诸如自然堤、封闭积水洼地、沼泽低地等一系列地貌。这里河网纵横,湖泊密布,《禹贡》中提到河南境内有荥泽、蒲田泽、孟诸泽,山东境内有大野泽、菏泽、雷夏泽,河北境内有大陆泽等。由于黄河河道变迁和河水泛滥,这些泽薮约于秦汉以后逐渐消失,昔日的湖泊被掩埋于黄沙之下。全新世高温期即仰韶时期亚热带与北温带的分界线由秦岭—

淮河一线北移，将关中地区、晋南、豫北及山东地区，包括在当时的北亚热带之内。孢粉资料显示，不仅阔叶林、常绿林的某些树种在这些地区多有分布，连一些对气候变化反应极其敏锐的亚热带类型的动物——中华竹鼠、亚洲象、扬子鳄的遗骸，分别在陕西姜寨、河北阳原、山东王因等遗址中发现。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被茂密的森林覆盖，温暖湿润的气候，星罗棋布的河汉湖泊，肥沃疏松的土壤，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三、中原新石器时代聚落的形成

“中原”的面积约 16 万平方公里，北、西、南三面由太行山、伏牛山、桐柏山和大别山怀抱，地势西高东低，有高山、丘陵。东部为浩瀚的黄淮大平原，黄河自陕晋边境折向东流，由中部通过，淮河发源于桐柏，其支流沙颍河发源于河南西部的伏牛山，清澈的河水滋润着广阔、肥沃的黄（河）淮（河）平原。河南地处中原，位居中原腹地，地处中国的中心。全省境内群山起伏，大河纵横，平原辽阔，四季分明，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南部雨水充沛，适应稻作农业，中北部降雨量适中，适应旱作农业，以种植粟类为主。优越的自然环境，为古人提供了创造世界、塑造未来的广阔天地。地处东西南北交通的要冲，是中华民族古文化和古文明的发祥地。

裴李岗文化时代的先民是中原地区最早的居民，他们走出山洞，从在河谷平原和湖旁开荒种地，创建半地穴的住室开始，聚落伴随着出现。人们获取食物的来源逐渐发生了变化，由用狩猎、采集的手段向大自然索取，变成利用自然，种植农作物，食用植物的种子，即用生产的方法获得食物，迈向生产经济阶段。这一转变从时间上看，是漫长的，但是，这一转变是划时代的，引起了一系列的变革和创造。例如烧制陶器、磨制石器、驯化动物等，在创造中充分显示出先民的智慧。概括说有四个变化：

（一）陶器的发明

原始农业使人们获得大量的植物种子。人们的食物变成以植物的种子为主，食物来源发生了变化。怎样食用农作物的种子呢？传统的烧烤不能用了，只有用水煮的办法才行。可以说，陶器的出现是必然的，是应运而生。

（二）磨制石器的普遍使用

自原始农业出现，人们在营建住房时需要木材作柱、檩，耕作需要砍断树根，传统的细石器已经不适应砍伐了，用磨制的办法可以将石头加工成锋利的砍伐工具，磨制石器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磨制石器中，开始是从河卵石中选料，后来发展为用敲砸的办法，使石块变成可用的器形，石器的出现，是为适应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而出现、发展的，磨制石器的普遍使用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聚落的出现

为了发展农业，先民必须在耕种土地的附近住下来，营建遮雨的住房。半地穴的房

屋,成为先民生活的居地,聚落也随之出现。聚落以先民的住房为主,包括储藏物品的窖穴(或灰坑)、烧陶窑、墓葬、祭祀遗址、防御壕等,随着社会的进步,墓葬逐渐远离住房,在聚落内营建氏族公共墓地,最后墓地从聚落中彻底分离出去。

(四) 原始农业的出现

农业是先民主要生活来源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先民社会的发展。水稻、粟经过长期的种植和培育,逐渐变为中原地区先民的主要农作物。人们也开始了家畜的饲养,猪、羊、狗、牛等逐渐变成家畜。人们逐渐过上了长期、稳定的定居生活。

人们开始了定居生活,随着农业的发展,也孕育了中华的古老文明。这段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们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最终步入文明时期。这段历史,在文献中只有“穴居野处”、“茹毛吮血”、“作耒耜”、“刀耕火种”等,在社会发展顺序上有些记载:伏羲氏、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等,应是这段历史的代表人物。

人类走过上百万年的漫长道路,终于完成了从直立人向现代人的进化,人类文化获得了初步发展,社会组织结构也由原始群向母系氏族转变。到距今1万年时,终于迎来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变革,即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在这次大变革中,裴李岗文化时代的先民在中原率先从事农耕。从距今约9000年前开始,他们走出山林,在平原河湖旁边定居下来,开始了人工住居的建造,聚落也伴之出现。人们学会了植物的栽培和动物的驯养,发明了制陶术,制造出了磨制石器。考古学上把磨制石器称为新石器时代的核心。由于植物的栽培和动物驯养的出现,社会经济由攫取经济转变为生产经济,人们居住的聚落,包含当时供人们居住的房屋、烧制生活用器的陶窑、储存粮食的灰坑和埋葬死者的墓葬等。随着新石器革命的发生,即农业的发展,社会生产和技术发展的速度加快;人们从农业生产中获得丰富的食物,人类的繁衍能力增强,人口急剧增加;原始信仰和原始宗教进一步发展,原始艺术繁荣,原始文化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人类开始依赖土地,环境与人的关系更加紧密,地域意识开始出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联系增多,团结观念获得发展;社会组织结构由原来的原始群发展成氏族、家庭和部落,从而进入氏族公社时代。

氏族公社时代的历史没有文字记载,属于史前时代。正是因为没有文献记载,史前时代人类历史的研究只有通过聚落考古才能得到复原。如果说聚落是蕴藏史前历史的宝库。那么聚落考古就是打开史前历史的一把钥匙。聚落考古,可以丰富我们对于史前先民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农业,到发明陶器和磨制石器,一步步推动社会前进的认识,帮助我们认识中原地区先民是怎样从原始农业迈向文明的,解决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和分区,以建立史前时代的时间和空间框架。聚落考古也因此成为史前考古学的基础工程。中原是中华民族长期生活的地方,也是孕育中华文明的关键地区。聚落考古始于20世纪初在黄河流域的绳池仰韶村遗址的工作,后来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从黄河流域逐渐波及全国,在全国范围内发现了上万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掘了数百处聚落遗址,在全国确立了多种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由于¹⁴C测年的广泛运用,史前考古学文化的

绝对年代得以判定。多学科参加考古研究,浮选法和环境考古在考古学上的运用,促进了史前聚落考古的发展,从而建立起了全国主要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编年与考古序列。中原地区的考古序列也基本搞清,为我们研究聚落遗址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制度,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在这样的基础上,氏族公社时代的历史进程被大致勾画出来,氏族公社时代的生产、生活和文化图景逐渐明朗起来。

聚落的产生是伴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开始而产生的。人们为了农业的发展,将自己的住地选择在宜于农耕的河旁或湖旁的高地上。然后逐步营建住室,烧造陶器,磨制石器,饲养家畜。在人们居址范围内出现了房屋、陶窑、灰坑、墓葬、壕沟等,这就形成了聚落。聚落包含的内容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变化,如墓葬,开始时是埋在住房附近,后来发展为在聚落内设立氏族公共墓地,最后是彻底与聚落分离。龙山文化时期,打井技术的出现,将人们的生活范围进一步扩大。人们到远离河谷和湖泊的大平原上营建聚落,农耕经济迅速发展。聚落从自给自足的村落,发展为出现区域性聚落中心。遗址四周出现防御性的壕沟,为防止外族的入侵,进而兴建工程浩大的城墙。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于一体的城出现。有的遗址文化堆积很单纯,表明人们在此居住的时间短;有的文化堆积很厚,表明人们在此长期居住。

四、中原聚落考古的发现过程

中原新石器时代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古发现也首先从这里开始,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裴李岗文化都首先在中原发现。

(一) 仰韶文化在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发现

1921年,渑池仰韶村遗址的考古发掘开始。瑞典人安特生于10月带领中国地质调查所的5位工作人员对仰韶村遗址进行发掘,发掘17个地点,至当年12月6日结束,历时30余天。安特生将这次发现的彩陶、红陶和磨制石器为主的文化称为“仰韶文化”,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名称,但是,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孰早、孰晚,当时尚未找到正确的答案。

(二) 仰韶、龙山、殷代的关系首先在河南安阳后冈遗址解决

1928年梁思永先生在安阳后冈发现了“仰韶、龙山、殷代三叠层”,从时代顺序上解决了我国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关系,确定了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经过几十年考古工作者的调查、发掘,基本上搞清了仰韶文化的年代、内涵、社会性质。仰韶文化是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其分布北到长城沿线和河套地区,南达湖北的西北部,西到甘肃、青海接壤地带,东至河南东部的虞城马庄。共发现遗址数千处,分布范围广,延续时间长,内涵丰富,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学文化。在中原地区,已经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1000多处,考古发掘的主要遗址有陕县庙底沟、灵宝西坡、洛阳

王湾、郑州大河村、安阳后冈、濮阳西水坡、浙川下王岗、邓州（旧称邓县）八里岗等。仰韶文化在中原长达 2000 年，根据其文化特征，可以分为四个类型，即庙底沟类型、大河村类型（包括王湾类型、秦王寨类型）、后冈类型、下王岗类型。以黑陶、灰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因 1928 年首先在山东省章丘县（原属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现而得名。1931 年，梁思永先生主持河南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仰韶、龙山、殷代三个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相叠压，即著名的“三叠层”。这不仅从地层上解决了中国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文化）的发展序列问题，而且也是河南省最早发现并发掘的一处龙山文化遗址，所以，后冈遗址的发掘，在考古学上的价值和意义是相当重要的。20 世纪 40 年代以前，考古工作者对浚县大赭店、永城造律台遗址进行过发掘，发现其文化面貌以饰绳纹、篮纹、方格纹的灰陶为显著特征，与山东省发现的以磨光黑陶、素面无纹饰为主要特征的龙山文化有所不同。50 年代以后，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各地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发现龙山文化遗址 1000 多处。其中发掘的遗址有安阳后冈、大寒、八里庄，汤阴白营，永城王油坊、黑垆堆，鹿邑栾台，淮阳平粮台，郸城段寨，沈丘乳香台，郾城郝家台，登封王城岗、告成北沟，禹州（旧称禹县）瓦店，郑州沓冢王，洛阳王湾、姪李，孟津小潘沟，汝州（旧称临汝）煤山，陕县庙底沟、三里桥，浙川下王岗、黄楸树、下集，驻马店杨庄等。从而对河南省境内龙山文化的特征、分期、分区、社会经济、社会性质及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有了较多的了解和进一步的认识。1956 年，从统称的龙山文化中将河南龙山文化区分出来，并命名为“河南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实际上是河南境内龙山文化中晚期的泛称，河南龙山文化遍布全省，部分影响到山西省的南部、山东省的西南部、河北省的南部和湖北省的西北部。因地域不同，文化面貌也出现差别，可以分为 7 个类型：即王湾三期、后冈二期、王油坊、郝家台、三里桥、下王岗、石家河类型。从分布地域上看，在伊洛河流域有王湾三期文化类型，在豫北地区有后冈二期文化类型，在豫东地区有王油坊类型，在沙颍河流域有郝家台类型，在豫西地区有三里桥类型，在豫西南地区有下王岗、石家河类型。龙山文化时代的时间跨度是距今 5000 ~ 4000 年，是原始社会末期迈向文明时期的大变革时期。

（三）裴李岗文化在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发现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现较晚，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发现之后，经过 50 多年对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发掘和研究，人们逐渐认识到仰韶文化的繁荣绝非偶然，应有其源头，仰韶文化之前应该还有新的考古学文化存在。1977 年，河南省开封地区文管会对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进行发掘，在 118 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发现 8 座墓，全为成人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南北向。墓坑长 1.42 ~ 2.55 米、宽 0.83 ~ 1.22 米、深 1 ~ 1.35 米。坑内未发现有葬具痕迹。葬式多为仰身直肢，头向南。有为数不多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随葬，一般有石铲、斧、镰、刀、陶壶、罐、鼎等，M1 还随葬有石磨盘和磨棒。裴李岗所出土石器中，四足石磨盘、两端弧刃石铲、锯齿镰等，磨制

精致，器形特殊；陶器火候低，质松易碎，种类少，仅有弯月形耳的球形壶、筒形罐、三足钵、鼎、勺等。¹⁴C 测年，H1、H2 为距今（ 7885 ± 480 ）年，公元前（ 5935 ± 480 ）年（半衰期 5730 年）。说明裴李岗遗址所发现的古文化为当时所知中原地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文化类型——裴李岗文化。随着 100 多处裴李岗文化遗址的发现，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对裴李岗文化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而裴李岗遗址和新郑沙窝李遗址中的稷、粟，贾湖遗址的水稻，以及家猪、羊的发现表明，距今 9000 ~ 7000 年的裴李岗文化居民普遍栽培粮食作物并饲养家畜。

五、中原新石器时代诸文化的概述

（一）裴李岗文化

裴李岗文化因 1977 年 4 月在新郑裴李岗遗址首次发现而得名，目前在中原地区已经发现裴李岗文化遗址 150 多处。其分布南自潢川双岗，北达安阳洪岩，东起项城后高老家，西至卢氏薛家岭，重点分布在豫西山地区东部边缘的丘陵地带，以及豫中和豫南的黄淮平原地区，特别是嵩山周围比较密集，在豫北太行山东麓和豫南的大别山北麓也有发现。在这些众多的裴李岗遗址中，经过大规模发掘的遗址有新郑裴李岗、新密（旧称密县）荻沟北岗、长葛石固、舞阳贾湖、汝州中山寨、郟县水泉、新郑沙窝李、新郑唐户、济源长泉等，经过试掘的遗址有巩义（旧称巩县）铁生沟、滩小关、水地河、西关、瓦窑嘴，新密马良沟，登封双庙沟、王城岗，淇县花窝，濮阳孔悝城，许昌丁集，信阳平桥西，舞阳大岗，荥阳织机洞等。经过试掘和发掘，使我们对裴李岗文化的面貌、文化特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为裴李岗文化的社会性质、文化分期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裴李岗人”是中原原始农业的主人，他们创建了半地穴式住室，发明了陶器，普遍使用磨制石器，种植水稻和粟，饲养猪、羊、狗家畜，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乐器——骨笛，契刻中国最早的文字、雕塑，发明了最早的卜筮工具和最早的酿酒技术。裴李岗文化处于一个勇于创新的时期，为孕育中华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裴李岗人”用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劳动，从依赖自然、向自然索取的渔猎经济，迈向生产经济的伟大变革，完成了新石器时代革命。

（二）中原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因 1921 年在渑池仰韶村发现而得名，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目前全国已发现仰韶文化遗址数千处。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有自己的特征，仰韶文化的年代距今 7000 ~ 5000 年，历时 2000 多年。这个时期的仰韶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分布范围较裴李岗文化时期更加扩大，仅河南省境内就有 1000 多处，分布范围遍及河南全境，其东部边缘在豫东的睢县、民权、柘城（睢县周龙岗、民权牛牧岗、柘城马庄均发现仰韶文化的陶片，当为仰韶文化分布的东部边缘）。在文化叠压关系上，少数遗址的仰韶文化层有的是直接叠压在裴李岗文化层之上，大部分则是单纯的仰

韶文化遗址。也有的叠压在龙山文化层之下。遗址的面积大小不一，最大的仰韶文化遗址面积在 95 万平方米以上，形成了许多以大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根据其文化特征，考古学家将河南省境内的仰韶文化分为四个文化类型：以三门峡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仰韶文化，以嵩山为中心的郑、洛、汴、许地区的大河村文化，以豫北地区为中心的后冈、大司空类型和豫西南的下王岗类型。中原仰韶文化的居民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精美的彩陶表现出仰韶文化的居民生活多姿多彩（洪山庙的彩绘陶缸，大河村的日、月纹彩陶）。庙底沟类型的鲜艳彩陶；在房屋建设上，从半地穴式建筑向平地起建发展，浙川下王岗、邓州八里岗出现长屋，灵宝西坡出现大屋；文化方面，濮阳西水坡发现蚌塑龙虎，下王岗、邓州八里岗发现迁葬墓，灵宝西坡出现贵族墓地，其中一座 6 岁幼童的大墓有丰厚随葬品。此外，灵宝西坡遗址发现麻布，荥阳青台发现丝织品。农业方面，开始种植水稻和粟。家畜饲养方面，有猪、羊、牛、狗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聚落中心形成。灵宝西坡成为庙底沟类型的聚落中心，其南北环境，与东、西两条河共同构成防御体系。郑州西山城址的出现，则将仰韶文化的社会向文明推进了一步。

（三）中原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因 1928 年在山东章丘龙山镇首次发现而得名。龙山文化的年代距今 4900 ~ 4100 年，延续近 1000 年。这个时期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由多元走向统一。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有早晚之分，即早期龙山文化（又称“庙底沟二期”）和河南龙山文化。其年代划分为，距今 4900 ~ 4600 年为早期龙山文化（又称“庙底沟二期”），这个时期的遗址主要分布在中原地区的三门峡、洛阳、安阳、郑州地区，而南阳地区则为屈家岭文化，周口则为大汶口文化，信阳、驻马店地区为屈家岭文化、大汶口文化的交融地。在距今 4600 年之际，屈家岭文化、大汶口文化同时消失，河南龙山文化时期开始（距今 4600 ~ 4100 年）。这个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面貌焕然一新，陶色上一律以灰陶、黑陶为主，纹饰上出现绳纹、篮纹、方格纹。龙山文化遗址数量增加，波及中原地区的全部，仅河南省境内就有 1000 多处。从器形上看，地域性特征日渐明显，安阳后冈、洛阳王湾、永城王油坊、郾城郝家台、浙川下王岗诸遗址的龙山文化显露出各自的风采。从地层上看，在三门峡地区的陕县庙底沟遗址、渑池仰韶村遗址中，河南龙山文化层直接叠压在庙底沟二期文化层之上；在周口地区淮阳平粮台、郸城段寨、鹿邑朱台遗址中，河南龙山文化层直接叠压在大汶口文化层之上；在豫西南，有的直接叠压在屈家岭文化层之上，郾城郝家台遗址则是单纯的河南龙山文化遗址。

龙山文化的人们已经掌握了打井技术，打井技术的发现，扩大了人们生活的空间，可以把居住地建在远离河流、湖泊的广大冲积平原上，而广阔的冲积平原则是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最佳之处。所以，龙山文化遗址在分布范围上较仰韶文化遗址更加广泛，从丘陵、河旁台地，向广阔的大平原发展，遗址遍及中原地区的全部。遗址的面积大小不一，出现了许多以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群。在建筑上，龙山文化一般聚落的先民使用夯

土，夯打地基，夯筑房屋的墙壁，或使用土坯砌墙，同时使用石灰抹平地面和窖穴。龙山文化先民熟练地掌握了夯筑技术，在聚落中心用夯土构筑城墙，在淮阳平粮台出现了高台建筑、门卫房，都采用土坯构筑，同时发明了陶管道排污。农业生产上以种植水稻和粟为主，家畜饲养方面，六畜兴旺。

在中原地区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达千处，目前中原地区的考古序列已基本搞清，即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在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屈家岭文化、大汶口文化分别从豫西南和豫东涌向中原。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是一条贯穿中原文化的主线，这三种考古学文化，贯穿中原地区农耕时代发生、发展的历史，并以此为基础，经历了原始社会，并最终孕育了中华文明。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是我国由原始社会迈向文明的一支主干，它展示了中国古代原始氏族制度从繁荣到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在 5000 年（距今 9000 ~ 4000 年）的漫长历史行程中，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核心部分。由于它不断吸收周围诸文化的先进因素，又给周围诸文化遗存以不同程度的影响，它们共同为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原地区的先民在居住方面经历了洞穴、半地穴、平地起建、高台建筑四个阶段，而从半地穴式居室的出现开始，先民们从完全依赖自然，进入到利用自然发展原始农业的新石器时代。先民在选择住地方面，首先是以利于农耕为前提，河流的交汇处或湖泊附近，土地肥沃，是进行农耕的好地方。在其附近的高地上居住，在山地南坡营建住所，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活动的管理，而且有利于生活用水的汲取，又不会在雨季到来时被洪水淹没。高地上阳光充沛，在寒冬到来时，穴居还可以躲避冬天的寒风。由于裴李岗文化的先民是离开山洞、走向平原的先驱者，所以，在开始营建住室时还不会筑墙，只有采取“穴居”，即先在地上挖一个椭圆形或圆形的坑，周围栽上木柱，屋顶盖上茅草，以遮风挡雨，也就是文献上说的“穴居野处”。这样的半地穴式建筑虽然解决了先民走向平原后的居住问题，但也有自己的缺点——潮湿、阴暗。随着人们在生活上的需要，干燥、光亮的住室成为先民的理想住所，这种需求促进了建筑技术的逐渐提高。木骨架草泥墙的出现，使建筑形式逐渐由半地穴的深穴变为浅穴，最后变成平地起建，木骨架泥墙、夯土墙、土坯墙的使用，最终孕育了高台建筑的出现，人们的居住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居住条件的改善，人类社会也逐步从原始迈向文明。城的出现，标志着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的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城市制度的开始。关于城，恩格斯说：“只要村一旦变作城市，也就是说，只要它用壕沟和墙壁防守起来，村制度也就变成了城市制度。”^[7] 恩格斯又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的城壕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8] 恩格斯对城的出现给予高度的重视，认为城的出现是原始社会的村制度的结束和城市制度的确立，是文明时代的开始。

关于聚落，由于它产生、发展于没有文献记载的时候，只有运用考古学文化的时代，才能阐述清楚。本文阐述聚落的产生、发展的历史，在时间跨度上是从距今 9000

多年开始,至距今4000多年为止,根据考古学文化的时代序列予以介绍,即距今9000~7000年的裴李岗文化,距今7000~5000年的仰韶文化,距今4900~4100年的龙山文化。这里还要说明,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在中原的出现,从时代上看是在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从位置上说偏于豫东和豫西南,在中原只是局部出现。

关于与文献记载的三皇、五帝相结合的问题,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是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新课题。

注 释

- [1] 中国自然地理编写组:《中国自然地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79年。
- [2] ① 黄春长:《环境变迁》,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② 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第四纪孢粉组¹⁴C组:《辽宁南部一万年来自然环境的演变》,《中国科学》1997年6期。
- [3]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
- [4] 浦庆余:《三万年来我国气候变迁的研究》,《自然杂志》1980年3期。
- [5]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考古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 [6] 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逻辑概括》,《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 [8]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

(原载《中原文化大典·聚落》,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

裴李岗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黄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我们的祖先自古以来就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在漫长的岁月里，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河南省地处中国的中原，黄河从河南省的中部经过，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是中华民族最早活动的地区之一，至夏商时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所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首先要重视河南。河南省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非常丰富，主要有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由于河南地处中原，湖北省的屈家岭文化、山东省的大汶口文化分别影响到河南的南部和东部。作为考古文化，可以说，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是河南省古代文化发展的主要序列，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旋律。

裴李岗文化距今 8000 ~ 7000 年，仰韶文化距今 7000 ~ 5000 年，龙山文化距今 4900 ~ 4200 年，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距今 4100 ~ 3600 年。从以上四种考古学文化的年代看，他们是前后承袭发展的，是一脉相承的。

仰韶文化是 1921 年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龙山文化是 1928 年在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发现，作为 1977 年新发现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则是裴李岗文化。现在对裴李岗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予以介绍。

一

裴李岗文化自 1977 年发现以来，即引起考古学界的高度重视，经过十多年的工作，目前在河南省境内已发现遗址百余处，其分布范围南到潢川双岗，北至濮阳孔悝城，东达项城高老家，西至卢氏薛家岭和渑池班村。这些遗址的分布特点：在浅山丘陵地区，一般分布在距河较远、地势较高之处，特别是河流交汇的高岗上，大多是单一的裴李岗文化遗存。在平原地区，多分布在近河的岗丘上，遗址面积也较大，灰层厚，遗存丰富，在一些遗址中还有仰韶、龙山文化的遗存。经大面积发掘的遗址有裴李岗、莪沟北岗、长葛石固、舞阳贾湖、临汝中山寨、新郑沙窝李、郟县水泉等；经过试掘的遗址有新郑唐户、巩县铁生沟、密县马良沟、淇县花窝、许昌丁集、濮阳孔悝城、方城大张庄等 20 余处，因之对其特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经¹⁴C 测定，裴李岗文化是一个距今约 8000 ~ 7000 年，主要分布在河南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二

裴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新郑县西北 7.5 公里裴李岗村西双洎河岸的高岗上，高出附

近地面3~4米，高出河床25米，遗址面积2万平方米。1977年1月、1978年4月和1979年4月至10月三次发掘。文化层不厚，发现灰坑22个、陶窑1座和1处氏族墓地，清理墓葬114座。墓地位于遗址的西部，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均为南北向的长方土坑竖穴墓，没有葬具。除1座为双人合葬墓外，其余都是仰身直肢单人葬，从骨架和墓坑的情况看，大部分是成年人墓。一般都是小型墓，墓坑边不整齐，人骨架紧贴在生土上，随葬品1~10件不等，均为石器和陶器。只在两座墓的人骨颈下，分别发现绿松石珠1枚和2枚，为仅见的装饰品。只有三座墓形制较大，一座是双人合葬墓，墓坑长2.6米，宽2.1米，随葬器物14件。另两座墓坑长2.5~2.6米，宽1.9米，墓坑边缘整齐，随葬器物分别为18件和20件。值得注意的是，单人墓中除一座外，其余凡随葬石磨盘、磨棒的均不见石斧、镰、铲等工具，凡随葬有石斧、镰、铲的也不见石磨盘、磨棒，两者不共存。合葬墓的情况虽有不同，但从石磨盘、磨棒和石斧、镰、铲陈放位置来看，系分属两个死者。

裴李岗遗址出土的陶器，陶质粗糙，颜色不纯，多系红陶和棕褐陶，还有少数灰陶，火候低，一触即碎。夹砂陶中多有砂粒、蚌粉或炭料。泥质陶质地细腻，陶土经选择和陶选。陶器均为手制，陶胎厚薄不均，在小口双耳壶壁上还留有泥条盘筑的痕迹，小陶杯为捏制。陶器器表经打磨，种类不多，造型古朴，不甚规整。多为素面，有纹饰者不多，并多饰在夹砂陶器上。主要纹饰有篦纹、篦点纹、指甲纹、划纹、乳钉纹，还有个别绳纹等。陶质疏松，夹砂陶出土时用手搓捻即成粉末，晾干后稍硬。经测试，陶器烧成温度为900℃~960℃。主要器形有：敞口或大口三足钵、小口双耳壶、小口双耳三足壶、圈足壶、侈口深腹平底罐、直口深腹平底罐、双耳罐、罐形鼎、盆形鼎、大口弧壁平底碗、圈足碗、敞口浅盘、小口平底杯等。其中三足钵、双耳壶最多，是裴李岗文化最常见的典型器物，深腹罐次之，碗、钵再次之。

石器磨制精致，有石铲、斧、镰、磨盘、磨棒、弹丸等。石铲中不少是两端均有刃。石镰制作精细，通体磨光，刃部都有细小的锯齿，为一大特色。石磨盘和石磨棒为裴李岗文化的典型石器。磨盘平面作鞋底形，两端均为圆弧状，前部稍宽，后部稍窄，腰部内收，下多附四个柱形足，柱足的制法都是将磨盘底部凿去，留下四足。盘面上均有使用痕迹。磨棒一般呈圆柱形，中部经过长期使用被磨成扁圆或三角形^[1]。

根据裴李岗遗址出土的遗迹、遗物与周围已发现的各种新石器文化的不同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被确认为是一种新的文化遗存，定名为“裴李岗文化”。这一文化早于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遗存，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

三

在裴李岗文化中，以贾湖遗址的发掘面积最大，收获突出。贾湖遗址位于舞阳县北22公里的贾湖村东侧，位于泥河、灰河之间，面积5.5万平方米，中心地带文化层厚2米。1983年试掘，1984~1987年又进行五次发掘，发掘面积2355平方米；发现房基30